

由传统走向现代的 浙江农业

林 坚 杨柳勇等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浙江改革开放研究书系”编委会

主任：侯玉琪

副主任：蓝蔚青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列）

万 璞 方民生 史晋川

杨万江 汪水波 林 坚

罗卫东 胡祖光 黄祖辉

曾 驰 解力平

前　　言

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空前动荡和剧变的世纪，又是空前发展和进步的世纪。在这一百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可以说远远超过了以往的几千年。对于中华民族来说，这一世纪是决定生死存亡的历史转折时期。在这百年间，中国从极度衰弱、备受屈辱到奇迹般地重新站立起来，大踏步地走向繁荣富强。回顾中华民族的这百年沧桑和历程，也许我们可以从很多种不同的角度进行归纳和总结，但是，一代代仁人志士对“现代化”的不懈追求，肯定是进行这种归纳和总结的最为重要的视角之一。站在新世纪的开端回首上一世纪，我们感慨万千地看到，早在 1894 年，孙中山先生就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一响亮口号。然而，直到 1978 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愿望，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短短的 20 余年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及其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实绩，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瞩目。有些世界级的经济学家甚至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预言“到

21世纪初，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¹。无论这种预言的准确性如何，中国经济已处在一个迅速增长的起飞期显然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而浙江作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省份之一，已经由一个资源小省迅速崛起为一个经济大省，正在向“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挺进。在浙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浙江的广大农民依靠他们的勤劳、顽强与聪明，勇于实践，积极开拓，成为全国农民中最早和最好地适应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群体之一。可以肯定地说，浙江农村经济是浙江全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用“翻天覆地”来形容浙江农村改革以来的变化，是并不过分的。

综观浙江农村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全貌，农业的变化也许并不是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如果要总结“浙江经验”或概括出某种“浙江模式”，农业肯定不会在其中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以工业为主的农村非农产业的崛起，是推动农村经济和全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力量；大部分起源于农村地区及其小城镇的各类专业市场，使浙江获得了“市场大省”的美誉；走遍全国的数百万购销大军，其主体是浙江各地的农民；在工业、商业欣欣向荣的基础上，在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稳定就业之后，浙江农民开始告别其祖祖辈辈的农民身份，在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创造了自己的特色，并推进了全省的城市化进程……所有这一切，都是人们普遍关注到的浙江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也是许多学者倾力研究的重要课题。

本书把自己的研究范围集中在浙江的农业上，而没有将其扩展到整个农村经济，更没有将其扩展到整个农业社会，这并不是

¹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第二版）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2版，第904页。斯蒂格利茨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美国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等重要职务。

由于我们对上述引人注目的变化视而不见或对其意义有任何低估，而是因为：

第一，不管农业所占份额随着国民经济总量的扩张如何下降，农业始终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经济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而只能构成一种如刘易斯所称的“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社会结构”。

第二，我国和浙江的经济体制改革均发端于生产经营体制的改革，没有农村“第一步改革”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撼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深刻变化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原因，虽然与各产业部门相比，农业也许是浙江省向现代化目标迈进中速度相对较慢的一个产业部门，然而，浙江农业正在摆脱和逐渐远离传统农业则是毫无疑问的。并且，随着工商经济的日益壮大及其反哺或直接介入农业的能力的增强，随着新兴农业企业和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崛起及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随着规模经营和产业化经营的逐渐形成与不断完善，随着新一轮农业战略性结构调整在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下向纵深的不断推进，从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浙江农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步伐明显地逐渐加快，浙江农业正在逐渐成为一种可经营的真正意义上的“产业”，成为一种“Business”。同时也正因为如此，浙江农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以前从未出现过的新的问题。身处这样一个由传统农业蜕变成现代农业的历史过程中，是我们这一代农业经济研究者的幸运。

本书共分四篇，分别为“体制创新篇”、“投入产出篇”、“加工营销篇”和“前景展望篇”。我们希望能够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业各方面的演变和发展给出一种实事求是的描述，既记录下浙江农业由传统走向现代所留下的成功脚印，同时也记录下这一过程中所发生和遇到的问题，而纯经济理论的分析将不是我们这本

书的主要任务。我们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对浙江和其他地区从事农业与农村工作的同志有所启迪，从而推动我国农业更快地走向现代化。

林 坚

2001年7月

目 录

第一篇 体制创新篇

第一章 农村经济新体制的建立	(3)
第一节 积之既久,其发必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4)
第二节 人民公社体制的终结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6)
第三节 农村经济新体制的内容构筑	(13)
第四节 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的再造	(23)
第二章 农村经济新体制的继续探索	(29)
第一节 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的崛起	(29)
第二节 农业股份合作制的兴起	(34)
第三节 现代农业企业的创立	(41)
第三章 土地制度:农村经济制度的基石	(46)
第一节 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	(46)
第二节 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	(54)
第三节 土地制度改革中的组织创新	(60)
第四节 土地制度完善:任重而道远.....	(64)
第四章 回顾与展望: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业制度的演进	(68)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业制度演进的总体脉络	(68)
第二节 新型农业合作社：未来的农业组织主体	(70)
第三节 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互动关系	(75)

第二篇 投入产出篇

第五章 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浙江农业要素投入的增长	(85)
第一节 农业技术装备的逐步提高	(85)
第二节 农业劳动力投入数量的减少与素质的提高	(91)
第三节 农业资金多渠道投入体系的建立	(95)
第四节 土地的有效保护和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100)
第六章 浙江农业的产出与效益	(102)
第一节 20年农业产出的增长	(102)
第二节 浙江农业的产出效益	(113)
第三节 横向比较：浙江农业产出的现代化程度	(123)
第七章 浙江农业结构创新	(130)
第一节 浙江农业结构的变化及其原因	(130)
第二节 浙江农业结构变革性质的基本判断	(138)
第三节 浙江农业结构创新方向	(145)

第三篇 加工营销篇

第八章 农业产业化：农业发展观的调整	(155)
第一节 农业产业化的实质	(155)
第二节 确立农业产业化思路对浙江农业发展的 意义	(158)
第三节 浙江农业产业化程度的提高	(163)
第九章 从初加工到深加工：浙江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	(165)
第一节 农产品加工业生产能力的提高	(165)
第二节 农产品加工程度的提高	(180)

第三节	农产品加工业的现代化	(185)
第十章	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浙江农产品流通体制和农产品市场的演变	(190)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变迁及成效	(190)
第二节	农产品流通政策与实施效应	(208)
第三节	农产品流通组织结构的调整	(238)
第四节	农村市场的发育、发展和壮大	(245)
第五节	积极走向市场:浙江农民的选择	(257)
第十一章	从国内走向国际:浙江农业与国际市场的交融	(266)
第一节	浙江农产品国际市场的开拓	(266)
第二节	浙江农业国际化程度的提高	(272)
第三节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浙江农产品对外贸易的影响	(278)
第四篇 前景展望篇		
第十二章	浙江农业现代化所处的阶段及其基本特征	(285)
第一节	农业现代化程度(阶段)评价方法	(286)
第二节	浙江农业现代化所处阶段	(300)
第三节	浙江农业现代化的特征	(304)
第十三章	从世界农业的发展趋势看浙江农业的发展前景	(313)
第一节	世界农业发展趋势	(314)
第二节	农业新科技革命推动浙江农业和农村现代化	(324)
第三节	浙江农业发展战略的探讨和建议	(330)

附录一：1978～1999年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发展大事记	……	(351)
附录二：浙江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主要统计资料	……	(369)
主要参考文献	……	(375)
后记	……	(377)

第一篇 体制创新篇

经济体制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之上,又给生产力以强大的反作用,它既可以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也可以解放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0年前的农村改革正是以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方式,释放浙江农业生产力,孕育了浙江现代农业的萌芽,并通过20年的“浇灌”,已形成现代农业的雏形,其中伴随着农业经营制度的剧变,和逐步建立的适应生产力状况和现代农业发展的制度渐变,形成了浙江现代农业制度的基本格局和特色。

本篇简略回顾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详细总结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浙江在制度创新方面的 new 尝试和新经验,其中突出土地制度是农村经济制度的核心和关键,土地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解决家庭承包与双层经营、土地规模经营、农业股份合作之间内在矛盾的可贵尝试。新的农业组织的建立则是农业体制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必然选择,其中新型农业合作社是未来农业组织的主体。

制度创新为浙江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提供了广阔的驰骋空间,是农业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在宏观经济体制整体转型的历史背景之下,甚至是首要之义。

第一章 农村经济新体制的建立

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同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朋友亲切交谈，语出惊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①又说：“这是社会主义利用这种方法来发展社会生产力。”^②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提法到了14年后在党的十四大上通过组织程序在全党正式确立，在当时甚至无法见诸报端，但是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却在2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后已开始了，那就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在经历了长期计划经济和人民公社制度后实施市场经济的尝试，并成为整个国家经济改革、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试金石。要总结20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就不能不首先总结20年前开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要总结中国农村20年的改革与现代农业发展的经验，就更不能不从20年前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起。

浙江的农村改革的起点和主要历程是与全国一致的，但是具体步骤和改革所带来的结果是有差异的。20年改革形成了具有浙

^{①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江特色的农村经济体制。这一点是我们总结浙江 20 年改革经验和分析建设具有浙江特色的现代农业体制与农业增长方式的过程中所必须首先考虑的。本章主要概述农村经济新体制的建立和新体制的主要创新。它是浙江农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起点。

第一节 积之既久，其发必速：农村 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

20 年前的改革从农村改革起步，农村改革又从农业经营体制着手，这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一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背景。20 年前，我国农业生产力的状况是 80% 多的人口在农村，人均耕种的土地很少，而且日益减少，农民对土地的劳动密集型耕种（提高复种、精耕细作等）及缓慢的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农业增长仅够维持人口的增长；农业劳动基本依靠人力和畜力，只有少量的资金投入农业，劳动生产率很低；以自给半自给农业为主，表现为传统农业特征。浙江省的情况与全国一样，尽管从 1949 年后的 30 年中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主要作物的生产总量持续增长，特别是粮食产量的增长较快，人均粮食产量从 1949 年的 206 公斤增长到 1978 年的 391 公斤，但是农业部门依然很落后，农业结构单一，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如农业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 1949 年为 85%，到 1978 年反而提高到 88%；粮食作物种植面积占农作物总种植面积的比重，1952 年为 78%，1978 年仍有 73%；到 1978 年，农民人均收入仅为 165 元。这样的农业结构和生产力水平不可能孕育出现代农业。

二是自上而下的农业计划体制完全扼杀了农业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并成为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20 年前，农业（农村）经济作为整个国家计划经济模式的一部分，以人民公社体制为载体，从

农业生产到流通和价格都是计划安排的,同时在产业政策上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农业为重工业提供资金积累的政策,即通过农产品低价及剪刀差的途径把农业积累转移到工业中去。为此,农业成为一个严重压抑的部门,成为一个长期徘徊的部门,进而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条“短腿”。同样严重的是,由于实行抑制性低价及差价关系的混乱,造成了农产品价格体系的紊乱,窒息了市场机制的活力;加上主要农产品流通受限制,由国有商业和供销社商业垄断,不允许自由市场存在,使农业生产更加缺乏有效刺激。更何况,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在农业经济体制上追求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使农业生产体制完全脱离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生产队也演变成农业生产计划的执行者,丧失了自我盈利、自我发展的能力,农民家庭更是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结果是占人口 80% 多的农民有时连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

三是由农业生产力低下和“左”的体制共同作用而衍生的城乡关系的割裂和对城市倾斜的政策。仅仅是农业生产力低下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必须对农业体制进行改革,而仅仅是农业计划体制或人民公社体制也不能充分说明改革的必要性。事实上,由这两者衍生出的城乡关系的割裂并向城市倾斜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也是我们认识 20 年前这场伟大改革背景的一个重要方面。由城乡割裂造成的严重的二元结构,抑制了农业资本的积累和农业生产力的增长,造成了农村比城市更为贫困且差距越来越大的状况,造成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渐成为政治问题,到了非改不可的“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在总结农村改革成功经验时说:“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地基是不行的。”^① “……如果不能解决这百分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65 页。

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①

传统农业的生产力水平，严重不适合生产力发展，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农业经济体制，以及相互割裂并向城市倾斜的城乡关系或二元结构，这三者一起累积的时候，改革的前奏曲奏响了，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积之既久，其发必速，中国农村改革注定是急风暴雨式的制度变迁。尽管农村改革是农民的首创，但是没有邓小平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对这场改革进行总的设计，如此有秩序的改革是难以实现的。邓小平不仅从空间上看到了这场农村改革的必然性和广阔性，而且也看到了时间的紧迫性和深远性，认识到改革越早越彻底越好。在 1983 年初，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尚不彻底，且思想也不够解放，邓小平当时就说：“农业搞承包大户我赞成，现在放得还不够。”^② 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农村改革的深刻认识。这是我们认识农村改革的政治思想背景。

第二节 人民公社体制的终结和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

浙江的人民公社体制与全国一样是在 1958 年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建立起来的。这年的 8 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指出：“人民公社是建立社会主义和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8 月 27 日，中共浙江省委发出了《关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7 页。

② 同上，第 23 页。

于发展人民公社的意见》；接着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和全省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强调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指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现在还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将来逐步发展为全民所有制。会议对人民公社的性质、目的、规模、方针、政策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要求会后要既快又好地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做到“轰轰烈烈搞生产，欢欢喜喜办公社”。9月30日的《浙江日报》报道了全省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的消息。仅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把全省33118个农业合作社合并成674个人民公社，平均每社8511户，由公社统一核算和分配。由于强调“政社合一”、“一大二公”，使得公有化程度越来越高，到1960年全省人民公社合并为598个，平均每社9497户。以后对公社规模进行了调整，直到1961年才基本稳定下来。

人民公社一开始实行的是由公社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的大一统的体制和相应的军事化的组织形式。其本质特点是完全否定社员和家庭的积极性，也否定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财产的独立性，农业生产、流通和分配成为国家统一计划的一部分。在农业生产的指导思想上，严重地泛滥着以高指标、瞎指挥，刮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是造成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主要人为原因。以浙江省为例，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农业总产值指数，如果1958年为100，那么1959～1961年分别为96.4、83.5和75.8，1961年比1958年下降了约1/4，其中种植业和畜牧业产值分别下降了16.2%和44.8%；粮食总产量1961年比1958年下降17.1%，粮食平均亩产从296公斤下降到253公斤，粮食人均占有量从308公斤下降到248公斤；其他作物产量普遍大幅度下降，其中棉花下降16.6%，油菜籽下降52.5%，黄红麻下降23.6%，糖蔗下降64.2%，蚕茧下降54.0%，茶叶下降60.9%，柑橘下降36.2%；畜牧业生产除了羊、兔、蜂有所增长外，猪、牛饲养量分别下降8.7%